

关于《徐文长文集》评点的真伪问题

——兼及评点在晚明文学发展中的作用

徐 艳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摘要:《徐文长文集》的评点部分实属伪作, 创作者即是文集的编撰者钟人杰。评点中包含了大量与袁宏道对徐渭作品的评价很不一致的内容, 可以说, 是《徐文长文集》评点确立了徐渭在当时文坛的地位, 从中可睹评点在晚明文学发展中所起作用之一斑。

关键词: 《徐文长文集》评点 伪作 袁宏道 钟人杰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B

现存最早的署名袁宏道的《徐文长文集》评点, 为万历四十二年钟人杰刻本, 收有诗文三十卷, 《四声猿》一卷, 卷首载黄汝亨、虞淳熙的序, 及陶望龄、袁宏道的徐渭传记。《徐文长文集》评点刊行后影响较大, 成为徐渭作品的流行版本。《四库全书存目》著录的《徐文长集》三十卷即此版本, 提要曰: “渭所著有《文长集》、《阙编》、《樱桃馆集》三种, 钟瑞先合刻之, 以成此集。又有商濬所刻, 题曰《徐文长三集》者, 亦即此本。”¹其实, 首先将徐渭作品加以合刻的是商维濬(初名“商濬”, 更名“商维濬”), 《徐文长文集》(即文中的《徐文长集》, 其最初行世的书名为《徐文长文集》)是以《徐文长三集》为底本又多有删略而成。之所以造成《提要》错误描述其版本源流, 是因为《徐文长文集》在当时传播较广, 现存《徐文长文集》之各种版本数即远远超过《徐文长三集》。而形成《徐文长文集》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 在于其中载有袁宏道的评点。

但通过有关材料的证明可以看出, 《徐文长文集》的评点部分实属伪作, 创作者即是文集的编撰者钟人杰。

由于《徐文长文集》成为徐渭作品最为流行的版本, 其中的评点亦成为袁宏道欣赏徐渭作品的具体例证与说明(而评点中却包含了大量与袁宏道对徐渭作品的评价很不一致的内容), 这就确立了徐渭在当时文坛的地位, 引起晚明文人对徐渭较为普遍的推崇。从中可睹评点在晚明文学发展中所起作用之一斑。

《徐文长文集》评点刊刻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 其时距袁宏道(1568-1610)离世已有四年。黄汝亨为评点作序, 其中说: “世安可无异人如文长者也! 钟生瑞先嗜异人, 常三复其集。因得中郎帐中本, 遂喜而校刻之。”²这是交代该评点来源的唯一线索, 其中“钟生瑞先”是指钟人杰, 其字瑞先, 钱塘人。从时间上看, 应该是袁宏道离世以后, 钟人杰获得了袁宏道的“帐中”之“本”而加以刊刻。但钟人杰何以能在袁宏道去世后, 得其原先从未公诸于世的“帐中本”呢? 序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揆之情理, 应存在这样的可能: 或是袁宏道的亲属借给钟人杰的, 但若如此, 文集前当有袁宏道亲属所作的序跋或钟人杰自己的交代, 该书前却既无这类序跋, 也无钟氏的说明; 或是袁宏道身后家庭有了变故, 故其“帐中本”流失在外, 使钟人杰得以有刊刻的可能, 但袁宏道身后并未有此类家庭变故。这使该评点的来源显得颇为可疑。

在《徐文长文集》评点刊刻的同年九月, 袁中道曾作文申讨当时流传的署名袁宏道的伪作, 并因此而罗列了袁宏道的所有作品:

袁无涯作别, 觅予诗文入梓。予曰: “方报病, 未能料理。”惟以中郎未刻诸书付之,

且嘱其订正。如书坊中《狂言》等，俱系伪书，见之欲呕，而今皆收入集中，殊可恨。总之，中郎所著书，始有《敝篋集》，乃作诸生、孝廉及初登第时作也。继有《锦帆集》，令吴门作也。继有《解脱集》，吴门解官，与陶石簣诸公游吴越诸山作也。继有《广陵集》，弃吴令改教，暂携妻子寓仪真作也。继有《瓶花集》，则为京兆授为太学，补仪曹时作也。继有《潇碧堂集》，则六年高卧柳浪湖作也。继有《破研斋集》，则再补仪曹时作也。继有《华嵩游草》，则官吏部，典试秦中往返作也。盖自秦中归，为明年庚戌，而先生逝矣。其存稿可一册，中有奏疏数首，因哀集付无涯。其他选校之书，若《宗镜录》，若《删定六祖坛经》，若韩、欧、苏三大家诗文，《西方合论》，或已刻，或尚留于家，此外无余矣。……无涯曰：“闻中郎先生尚有谈性命之书五十余卷，不知何在？”予曰：“未有见。中郎先生片纸只字，皆有一段精光，惟恐不存，岂有书至五十余卷，而听其散佚者乎？我与中郎形影不离，设有之，岂不经予眼，及诸开士与其儿子眼耶？中间与人书牋，信笔写去，一时不存稿者有之；或前后意见不存，自觉不相照应，而删去者有之。遂据以为有遗书，未可也。”无涯曰：“然。先生若有此书，岂不以相授，而作帐中之秘耶？”遂别去。³

袁中道在该文篇末否认存有“遗书”。袁无涯与袁宏道、袁中道皆交谊很深，袁宏道的《敝篋集》、《锦帆集》、《解脱集》、《瓶花斋集》、《潇碧堂集》等作品即为袁无涯刊刻，但此时连袁无涯都未能得到所谓的“帐中之秘”，与袁宏道、袁中道少有交往的钟人杰又如何能得到呢？《徐文长文集》评点中载有虞淳熙的序，篇末署“万历甲寅孟秋钱塘虞淳熙长孺父书于山馆”⁴，可知其于万历四十二年七月作于钱塘。袁中道该段文字则于万历四十二年九月作于公安，袁中道的议论在后，所以也不存在袁中道在写作该文时尚未看到袁宏道遗存的《徐文长文集》评点，此后随着遗物整理又有新发现的可能性。此外，袁中道罗列的中郎诸书以其著作为主，并包含了“选校之书”，且肯定“此外无余矣”。三十卷的《徐文长文集》评点并不同于“信笔写去，一时不存稿”的书牋，当不会被认为“中郎先生片纸只字，皆有一段精光，惟恐不存”，且与“中郎形影不离”的袁中道所疏漏。

二

《徐文长文集》的底本是万历二十八年商维藩刊刻的《徐文长三集》二十九卷、《四声猿》一卷。后者载有陶周望所作的《刻徐文长三集序》，其曰：“徐渭文长故有三集，行者《文长集》十六卷，《阙编》十卷，藏者《樱桃馆集》若干卷。行者板既弗善，而渭没后藏者又寝亡轶。予友商景哲及游渭时，心许为汇刻之，及是叹曰：‘吾曩虽不言，然不可心负亡者。’遂购写而合之，属望龄詮次，授诸梓。”⁵篇末记载时为万历庚子（二十八年），可见是曾经师从过徐渭的商维藩于万历二十八年首先将徐渭的文集“购写而合之”，请陶望龄“詮次”并作序，刻成《徐文长三集》。但以其为底本的《徐文长文集》面世后流传之广、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了《徐文长三集》，这使商维藩极为愤激，于万历己未（四十七年）重新刊刻《徐文长三集》，并作有《刻徐文长集原本述》。该文针对《徐文长文集》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袁宏道评点的刊载，揭露了评点的伪作性质，并强调了《徐文长三集》的刊刻与袁宏道之间的密切关系，兹引如下：

予尝小筑卧龙山，石簣陶公读书其中。袁中郎偶过越水访公，公与欢饮，各别就寝矣，中郎见几上《四声猿》一帙，阅竟汲趋问公：“此必元人笔也？”公笑曰：“否，否，越中才人徐文长作，尚有诗赋传记表笺尺牋数万言，与吾友商景哲雅相善，故尽得之。”遂出笥中藏，中郎忻然手翻，篝灯达旦，凡读一篇一击节，直恐其尽，至忘假寐。谓公曰：“才思奇爽，一种超逸不羁之致，几空千古。景哲既以嗜古特闻，当不令此书灭没蠹鱼。”晨起造予而请梓，因语予：“文长奇才，一字一句自有风裁，愈粗莽，愈奇绝，非俗笔可及。慎勿描画失真，为世大痛。”中郎即援笔为序，陶公和之，阅两月而刻成，果无不人人竞赏争取，纸贾倍贵。迨予燕游，射利子谬加评点，转相窜易，殆不可令中郎见也。燕中名公诸大老，亦复咨嗟失真，向予索原本甚众，政如西子自美，而嫫母其

粉黛，见而疾走若避鬼物，无足怪者。今春归，辄次第所藏板，印而行之，庶几复见文长本色云。嗟嗟！中郎、石簣篝灯夜读状宛然如昨，而文长且得至今存也。予亦可谓不负三君子矣。万历己未（四十七年）岁初夏，会稽商维濬景哲父书于西湖也宜楼中。

文中强调的《徐文长三集》的重印原因是值得重视的，即由于“射利子谬加评点，转相窜易”，使文集大为“失真”。所谓“谬加评点”即指《徐文长文集》评点，商维濬明确指出其为伪作，“殆不可令中郎见也”，“政如西子自美，而嫫母其粉黛，见而疾走若避鬼物，无足怪者”。

《徐文长文集》评点面世后，书贾又对其不断翻刻。现存该书的明刻本中，有的卷首载黄汝亨与虞淳熙的序（如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徐文长文集》），有的卷首载黄汝亨序（如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读书坊刻本《徐文长全集》），有的卷首载虞淳熙序（如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徐文长全集》，以上诸种都附有陶周望与袁宏道所作的《徐文长传》），有的没有序，而只附有陶周望与袁宏道所作的《徐文长传》（如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徐文长集》）。可见该书在当时影响大，销路好，从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本子，并从钱塘传至燕京，使正“燕游”的商维濬获见后大为激愤，故又印行“原本”，万历四十七年印行的《徐文长三集》现亦可见⁶。

但若将文中描述的万历二十八年《徐文长三集》的刊刻过程和载于该书卷首的袁宏道《徐文长传》（以下简称《传》）及其它有关材料对照，会发现其中包含了很多不符合事实的内容，现引《传》中有关文字如下：

余少时过里肆中，见北杂剧有《四声猿》，意气豪迈，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题曰天池生，疑为元人作。后适越，见人家单幅上有署田水月者，强心铁骨，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字画之中宛宛可见。意甚骇之，而不知田水月为何人。一夕坐陶编修楼，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急呼石簣：“《阙编》何人作者，今耶古耶？”石簣曰：

“此余乡先辈徐天池先生书也，先生名渭，字文长，嘉隆间人，前五、六年方卒。今卷轴题额上有田水月者，即其人也。”余始悟前后所疑，皆即文长一人。又当诗道荒秽之时，获此奇秘，如魇得醒。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童仆睡者皆惊起。余自是或向人或作书，皆首称文长先生。有来看余者，即出诗与之读，一时名公巨匠，津津知向慕云。

《刻徐文长集原本述》（以下简称《原本述》）之与事实不符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如《传》中所言，袁宏道是“少时”见天池生《四声猿》而“疑为元人作”，并非像《原本述》所说是于陶宅中首次看到该作，并疑为元人所作。

其二，《传》中描述的袁宏道于陶宅中看到《阙编》的时间为其改授教职后游越的万历二十五年。袁宏道同年作有《吴敦之》尺牍，曰：“所可喜者，过越，于乱文集中识出徐渭，殆是我朝第一诗人，王、李为之短气。”⁷而据《原本述》记载，袁宏道在陶宅中“篝灯达旦”地沉醉于徐渭作品之中的第二天清晨即造访商维濬请其刊刻，文集“阅两月而刻成”。陶望龄所作《刻徐文长三集序》记载时为“万历庚子春仲吉”，即万历二十八年二月，由此上推，袁宏道于陶宅首次见到徐渭作品当为万历二十七年底，但其时袁宏道并不在会稽，而在北京（袁宏道于万历二十六年即入京）。

其三，万历二十五年袁宏道只看到残本《阙编》，即《传》中描述的“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之“《阙编》诗一帙”。《传》中又曰：“周望言：‘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录，今未至。余所见者，《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可见直到作《传》的万历二十七年，袁宏道仍未见到徐渭的所有作品。“无刻本，集藏于家”的“晚岁诗文”是指《樱桃馆集》，陶周望《刻徐文长三集序》中曰：“徐渭文长故有三集，行者《文长集》十六卷，《阙编》十卷，藏者《樱桃馆集》若干卷。行者板既弗善，而渭没后藏者又寝亡軼。”其中面临“亡軼”危险的“藏者”《樱桃馆集》即是袁宏道未见到的“晚岁诗文”。袁宏道不仅其时未见到该集，连文集的名称亦无从知晓，故在有关论述中只是以“晚岁诗文”、“老年诗文”等称之。万历二十六年袁宏道《答陶石簣》中曾曰：“徐

文长老年诗文，幸为索出，恐一旦入醋妇酒媪之手，二百年云山，便觉冷落，此非细事也。”⁸希望陶望龄能将徐渭的“老年诗文”“索出”。作于同年的《孙司李》尺牋又曰：“徐文长，今之李、杜也，其集多未入木，乞吾兄化彼中人士，为一板行。”⁹孙司李指孙应祥，万历十六年举人，时任绍兴府推官，即上引《传》中言及之“同年有官越者”（袁宏道亦万历十六年举于乡），“未入木”的徐文长集当指《樱桃馆集》。虽万历二十六年袁宏道曾托陶望龄和孙司李“索出”或“板行”《樱桃馆集》，但到作《传》的万历二十七年此事仍未如愿。故袁宏道在将《传》与其它作品一齐寄送陶望龄时，又旧事重提，作于同年的《答陶石簪》曰：“《广庄》是弟去冬所作，《瓶史》乃今春著得者，俱附上请教。《徐文长传》虽不甚核，然大足为文长吐气。往曾以老年著述托孙司李，久不得报，恨恨。兄幸令侍者录一纸送司李处，渠当留意矣。”¹⁰希望陶望龄将《徐文长传》“录一纸送司李处”，以敦促其搜集刊刻徐渭“老年著述”。

万历二十八年刊刻的《徐文长三集》不仅将《樱桃馆集》索出，且将三种文集一齐刊刻，这“购写而合之”的功绩主要当归于商维濬，为商维濬挚友、姻亲的陶望龄在其中亦起了较大作用¹¹。陶周望《刻徐文长三集序》中提到其对文集的“詮次”，其后又在《与友人》尺牋中曰：徐文长“诗文实有深诣，与作者旨吻合。而世方持肤鞞，为雷同，知者盖鲜。仆以为文长之才，天下后世之大且远，不患无知，患在湮而不传，则罪在我耳，故哀而刻之”¹²，提及自己对徐渭作品的传播责任，并因此“哀而刻之”。这样的责任心与万历二十五年袁宏道与陶望龄在一起时对徐渭作品的激赏，及其后袁宏道对陶望龄搜集徐渭“老年诗文”的期望是分不开的。

但《原本述》中的有关描述却与此不符。文中记载袁宏道在陶宅看到《四声猿》后，陶望龄向袁宏道介绍，徐渭“尚有诗赋传记表笺尺牍数万言，与吾友商景哲雅相善，故尽得之”，“遂出笥中藏，中郎忻然手翻，篝灯达旦”，即陶望龄其时藏有徐渭所有作品，且都借自商维濬，这使袁宏道当夜就看到了徐渭的所有作品，于是第二天清晨造访商维濬，请其刊刻。由于徐渭文集当时已收全，故能刊刻得极为迅速，——“阅两月而刻成”。但这显然与上文所引袁宏道有关文章中提到的其万历二十五年只看到残本《阙编》，后又见到《徐文长集》，直到万历二十七年仍未见到《樱桃馆集》等情况极不吻合。

其四、《原本述》中记载袁宏道于惊赏徐渭作品后“晨起造予而请梓”，且“援笔为序”，这与上文所引陶周望《刻徐文长三集序》中的内容有较大冲突。该序在描述当时徐渭作品之版本不善和面临亡佚后，称赏“予友商景哲及游渭时，心许为汇刻之，及是叹曰：‘吾曩虽不言，然不可心负亡者。’遂购写而合之，属望龄詮次，授诸梓”。可见，是因商维濬为徐渭门生，故购写、合刻徐渭文集，并请求陶望龄“詮次”。本不存在什么袁宏道“请梓”且“为序”的情节。此外，《传》中也没有相关记载，袁宏道《解脱集》（收入袁宏道万历二十五年的作品）和《瓶花斋集》（收入袁宏道万历二十六年至万历二十八年之间的作品）中亦不见有该序。正如前引袁宏道《答陶石簪》中所云，万历二十七年袁宏道曾将在北京所作的《传》寄送陶望龄，所以明年《徐文长三集》刊刻时，陶望龄便将其附于集中了，这是《徐文长三集》中为何载有袁宏道《传》的原因。

商维濬在二十年后重新“补充”以上这些万历二十八年刊刻《徐文长三集》时本未提到的细节，只为了一个目的，即表明其与伪托袁宏道评点的《徐文长文集》相比，与袁宏道有着更为密切的亲缘关系。但这样的编造只能弄巧成拙，不仅未能引起人们对文集的足够重视，甚而湮没了其中本属事实的内容。

《原本述》虽指出了《徐文长文集》评点部分的伪作性质，但仅凭这样的一家之言已无法作最后结论，下文将对照袁宏道的有关论述对此作进一步证明。

三

袁宏道文集的部分篇章记载了其佳赏徐渭作品的具体情况，其中不仅没有任何关于评点徐渭作品的记载，且有关内容与《徐文长文集》评点的创作颇有抵牾。

袁宏道文集中关于徐渭作品的论述，包括《徐文长传》和八则书牍。除一则书牍作于万历三十年，其余都作于万历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间，袁宏道对徐渭作品的评价正可因此而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袁宏道对徐渭作品备加称赏，并主要欣赏其诗歌，如《徐文长传》中有这样的描述：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

文中认为徐渭诗歌具有对作者坎坷人生之丰富感受的较强表现力，即能“达”其“悲”，姿态万千。其中“一一皆达之于诗”、“故其为诗”云云，都着眼于徐渭诗歌。另外的七则书牍亦对徐渭大为推崇，而提到的也主要是其诗歌：《吴敦之》中称徐渭为“我朝第一诗人”；《答梅客生开府》认为徐渭之“知诗”“稍不愧古人”¹³；《答梅客生》也认为徐渭之诗“为近代高手”，且欲“叙其诗而传之”¹⁴；《孙司李》中，袁宏道请其搜集刊刻徐渭作品的理由在于“徐文长，今之李、杜也”，“李、杜”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诗歌创作，故亦属夸赞徐渭的诗作；两篇《答陶石簪》尺牍之提到徐渭，都是为了徐渭文集的搜集刊刻，虽然没有特意提到徐渭诗歌，但正如《孙司李》中所言，搜集刊刻徐渭作品的原因在于其是当今如“李、杜”那样的大诗人；《冯侍郎座主》又提到“宏于近代得一诗人曰徐渭”¹⁵。

袁宏道之所以偏爱徐渭诗歌，而几乎很少提及其散文的原因在于，徐渭散文有着与诗歌相比更接近传统的文体特征，这与袁宏道的有关主张有所不同。徐渭曾这样自评其文：“稍融会六经，及先秦诸子诸史，尤契者蒙叟贾长沙也。故为近格，乃兼并昌黎、大苏，亦用其髓，弃其皮耳。师心横从，不傍门户，故了无痕凿可指。”¹⁶陶望龄于《刻徐文长三集序》中这样描述徐渭散文：“往往深于法而略于貌，文类宋、唐”，“然其文实有矩尺”。可见徐渭文章虽有“师心横从，不傍门户”的高标，但对传统文体规范的依循仍在其文体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与其诗歌包含的更多文体创新成分有所不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评价徐渭诗文：“其诗欲出入李白、李贺之间，而才高识僻，流为魔趣。选言失雅，纤佻居多。譬之急管么弦，凄清幽渺，足以感荡心灵，而揆以中声，终为别调。观袁宏道之激赏，知其臭味所近矣。其文则源出苏轼，颇胜其诗，故唐顺之、茅坤诸人皆相推挹。”从其中的抑扬中正可见徐渭诗歌的创新因素要多于散文，故为袁宏道“臭味所近”，而散文则多遵循唐宋古文文体规范，因而得到唐顺之、茅坤等人乃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撰者的首肯。

但后一时期，即万历二十七年以后，袁宏道对徐渭作品的态度发生了较大变化，即由前一时期的大加推赏而渐趋淡漠，评论范围亦由单纯只及其诗而诗文并及，且认为其诗文皆有利弊。这一时期袁宏道对徐渭作品的评价见于《答徐可见太府》（万历三十年）和对《徐文长传》的修改，前者曰：

于鳞有远体，元美有远韵；然以摹拟损其骨，辟则王之学《华》。会稽徐文长稍自振脱，而体格位置，小似羊欣书。仁公何得遂奄有之！¹⁷

文中在以王献之摹习汉代《华山碑》比拟李攀龙、王世贞诗歌创作的同时，又以羊欣比拟徐渭，而羊欣不仅师从王献之，且曾被前人评为“书如大家婢为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¹⁸。可见袁宏道此时与早期认为徐渭诗作能使“王、李为之短气”，“无论七子，即何、李当在下风”的观点已有所不同。在其后的文集中，再未见到其提及徐渭或是徐渭作品。

此外，现存收录于《瓶花斋集》中的《徐文长传》和载于万历二十八年商氏《徐文长三集》卷首的《徐文长传》有较大不同，例如，前者将后者中“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如前文所引）以后的一段文字修改如下：

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¹⁹

文中增添的“体格时有卑者”这种原先没有的对徐渭诗歌的评价，与上引《答徐见可太府》尺牍中的有关内容正相一致，体现了当时袁宏道对徐渭诗歌的评价已有所降低；此外，又补充了原传中没有的对徐渭散文的评价。现存《瓶花斋集》为万历三十六年袁氏书种堂刻本，在袁无涯刊刻此书以前，袁宏道曾自己刻过《瓶花斋集》。万历三十四年，袁宏道作有《苏潜夫》尺牍，其中说：“今日刻《瓶花》、《潇碧》二集，几卖却柳湖庄。计月内可成帙，然不能寄远，以大费楮墨也。”²⁰但袁宏道自己的刻本现已不传。由于袁氏书种堂所刻《瓶花斋集》亦刊行于袁宏道身前，该文的修改当出于袁宏道之手，是其后期文学思想有所变异的产物。袁中道曾这样论述袁宏道后期文学思想的变异：“先生诗文如《锦帆》、《解脱》，意在破人之执缚，故时有游戏语；亦其才高胆大，无心于世之毁誉，聊以抒其意所欲言耳”，“自《破砚》以后，无一字无来历，无一语不生动，无一篇不警策”²¹，《华嵩游草》中“所著游记及诗，浑厚蕴藉，极一唱三叹之致，较前诸作，又一格矣”²²。可见袁宏道后期文学思想变异的方向是回归传统，改变早期游戏随意、才高胆大的为文方式，而愈趋“浑厚蕴藉”，袁宏道对徐渭散文的有所肯定正基于这样的背景。需要指出的是，袁宏道对徐渭散文的这种评价和其认为徐渭诗歌褒贬并存的态度是一致的，“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是指徐渭文中虽有“模拟”、“议论”的缺陷，尚未太多地束缚其才华的表现，或减损文章的格调。

与袁宏道对徐渭作品态度的前后变化对照，《徐文长文集》评点创作的可疑是非常明显的。《徐文长文集》评点由于以刊刻于万历二十八年的《徐文长三集》为底本，故当作于万历二十八年以后。但正如前文所述，万历二十八年以后，袁宏道对徐渭作品的评价已有所降低，不仅对其很少提及，还重新修正原先作《传》时的一些论述，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想象袁宏道又有评点徐渭全集的兴趣。

四

《徐文长文集》评点本身更包含了大量与袁宏道的文学主张及其对徐渭作品评价很不一致的内容，这也为后人判定其伪作性质提供了内证。

反对拟古是袁宏道文学主张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虽其一生有前后期文学主张的变异，但反对拟古的态度却基本一致。万历二十四年，袁宏道在《小修诗叙》中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一公安派的旗帜性纲领，所要反对的就是当时盛行的拟古文风，即“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何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要，可以不要，则虽欲存焉而不能。”²³认为秦汉文、盛唐诗之所以可贵，在于未沿袭前代而独出机杼，由此而得出“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的文学历史观念。作于同年而略前的《诸大家时文序》则指出拟古之“贗”，“大约愈古愈近，愈似愈贗，天地间真文渐灭殆尽”，其欣赏时文的原因在于“其体无沿袭，其词必极才之所至，其调年变月不同，手眼各出，机轴亦异”²⁴。该年所作的《丘长孺》尺牍又一一历述了自《三百篇》而下的传世之作所具有的各自为诗、互不相袭的特点，这是“真诗”、可“贵”的重要条件。作者还梳理了它们之间的历史关系，即“诗之气，一代减一代，故古也厚今也薄。诗之奇之妙之工之无所不极，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²⁵，在不否认前代文学作品之优势的情况下，指出后代文学作品之进化，将古今置于互有利弊的同等地位中加以比照，否定了一味强调古高于今的拟古论调，具有较强说服力。

以上这些反对拟古的论述是万历二十四年袁宏道创立性灵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万历二十五年，也就是袁宏道在会稽陶宅激赏于徐渭诗歌的那一年，其同样有着非常激烈的反拟古姿态，《张幼于》尺牍中即包含着有关争论：“公谓仆诗亦似唐人，此言极是。然要之幼于所取者，皆仆似唐之诗，非仆得意诗也。夫其似唐者见取，则其不取者断断乎非唐诗可知。既非

唐诗，安得不谓中郎自有之诗，又安得以幼于之不取，保中郎之不自得意耶？仆求自得而已，他则何敢知。近日湖上诸作，尤觉秽杂，去唐愈远，然愈自得意。”²⁶其中明确指出，自己最得意的诗作是那些“非唐诗”、“去唐愈远”、为“中郎自有之诗”的作品，这些诗作虽不为人认可，却是作者“自得”之作。同年的《江进之》尺牋又进一步阐述了与拟古者相反的对文学历史发展的理解，认为“其繁也，晦也，乱也，艰也，文之始也”，“其简也，明也，整也，流丽痛快也，文之变也”，而与后者相比，前者显然处于弱势，是需要被历史进步所淘汰的，即所谓“已简安用繁？已整安用乱？已明安用晦？已流丽痛快，安用聱牙之语、艰深之辞”，从而得出“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事今日之事，则亦文今日之文而已矣”等结论²⁷。

袁宏道该年之激赏徐渭作品即缘于这样的反拟古背景，正如《徐文长传》（商氏万历二十八年《徐文长三集》所载）中对当时情景的描述：“又当诗道荒秽之时，获此奇秘，如魔得醒。”所谓“诗道荒秽”，正指拟古之风；“获此奇秘，如魔得醒”，说明徐渭诗作与之不同，而投合于袁宏道对文学历史发展及独抒性灵的有关认识。下文“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眼空千古，独立一时”云云即是对后者的展开。同年《吴敦之》尺牋中将徐渭称为“我朝第一诗人，王、李为之短气”，同样因为其与王、李相比，能脱去拟古巢臼而自抒情怀。

万历二十六年袁宏道入京以后，其文学思想发生了一定变异，正如《冯琢庵师》所云：“宏近日始读李唐及赵宋诸大家诗文，如元、白、欧、苏，与李、杜、班、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谬谓前无作者。而学语之士，乃以诗不唐文不汉病之，何异责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颦乎。”“宏谬谓前无作者”中包含了与前期不同的对传统的肯定，但这同样基于和拟古者的对立，即对“学语之士”欲以“诗不唐文不汉病之”，“责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颦”的论调的悖反。收录万历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作品的《瓶花斋集》中载有与前期相近的反拟古的议论。《叙竹林集》曰：“善为诗者，师森罗万象，不师先辈。法李唐者，岂谓其机格与字句哉？法其不为汉，不为魏，不为六朝之心而已。是真法者也。是故灭灶背水之法，迹而败，未若反而胜也。夫反所以迹也。今之作者，见人一语肖物，目为新诗，取古人一二浮滥之语，句规而字矩之，谬谓复古，是迹其法，不迹其胜者也，败之道也。嗟夫！是犹呼傅粉抹墨之人，而直谓之蔡中郎，岂不悖哉！”²⁸严厉抨击拟古之“迹其法，不迹其胜者”，为“败之道”，相当于以皮相之“傅粉抹墨”替代实质的“蔡中郎”本人。《雪涛阁集序》则指出“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学习古人，不能“直求《骚》于《骚》之中”，而要以一种发展变化的方式来学习，如“苏、李述别及《十九》等篇，《骚》之音节体致皆变矣，然不谓之真《骚》不可也。”²⁹这不仅关联着其前期如“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等论述，又与当时对“李唐及赵宋诸大家诗文”的推崇暗合，也就是说，即使学习“李唐及赵宋诸大家诗文”，亦当以变化、发展的文学历史观念为前提。

这段时期，袁宏道不仅创作了《徐文长传》，更在尺牋中屡屡佳赏徐渭作品，主要原因即在于徐渭与当时拟古者之不同。《答梅客生开府》曰：“今代知诗者，徐渭稍不愧古人，空同才虽高，然未免为工部奴仆，北地而后，皆重儻也。”（万历二十六年）“古人”指那些袁宏道屡加赞赏的善于变化发展的古代优秀诗人，徐渭之创新自立“稍不愧古人”，故能超过“为工部奴仆”的空同和其后之“重儻”。《冯侍郎座主》又曰：“宏于近代得一诗人曰徐渭，其诗尽翻巢臼，自出手眼。有长吉之奇，而畅其语；夺工部之骨，而脱其肤；挟子瞻之辨，而逸其气。无论七子，即何、李当在下风。”（万历二十七年）徐渭诗歌的特异之处在于“尽翻巢臼，自出手眼”，具体表现为与古代的任何优秀作家都不相同：“有长吉之奇，而畅其语；夺工部之骨，而脱其肤；挟子瞻之辨，而逸其气”，因此，“无论七子，即何、李当在下风”。

正如前文所说，由于《徐文长文集》评点是以刊刻于万历二十八年的《徐文长三集》为底本，若其为袁宏道所作，则当作于万历二十八年以后。而事实上，即使在万历二十八年以后，袁宏道仍坚持着与拟古文风的顽强对抗。《叙弎氏家绳集》认为遂溪公“诗文之淡”

与陶渊明相近，但马上又指出“非似陶令也，公自似也”，并批评“今之学陶者，率如响撮，其勾画是也，而韵致非，故不类”³⁰，表现出与早期完全一致的反拟古倾向。《答曾退如》中又曰：“弟尝谓少陵真法魏、晋者，坡公真法班、马者。若直取其形似，是今之多髯者皆孔子，而面如瓜者皆皋陶也。”³¹反对“形似”、追求发展的态度仍然坚决果断。

其时袁宏道对徐渭作品渐趋冷淡，但对徐渭之异于拟古者的基本看法并未改变，也就是《答徐可见太府》中所说的徐渭与李、王之“以摹拟损其骨”不同而“稍自振脱”，以及修改后的《徐文长传》中指出的其诗歌之“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其文章之“不以模拟损才”云云。

和上述袁宏道反对拟古的文学思想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对徐渭作品的佳赏对照，《徐文长文集》评点的有关内容是极为失真的，如其常以“古”称赞徐渭诗歌，摘录如下：

殊古。（卷四《寄王子心葵》）

古丽。（卷四《酒徒》）

调逼古。（卷四《上冢》）

语语古雅。（卷四《感鹰活鹊雏事》）

幽沉古雅。（卷四《吴季子餉我细腰壶芦石上芝》）

有古趣。（卷五《述梦》）

苍凉入古。（卷五《观猎篇》）

跌宕古快。（卷五《又图卉应史甥之索》）

有古意。（卷十一《题折花美人图》）

若徐渭诗歌是如此“殊古”、“逼古”、“古雅”、“入古”，又何以能称其“稍自振脱”，“匠心独出”，更不能称之为“尽翻巢臼，自出手眼”，也不能在创新自立的层面上赞许其“稍不愧古人”。而若袁宏道之佳赏徐渭诗歌在于其近“古”，那么，袁宏道终身坚守的对抗拟古之壁垒便只有不攻自破了。

除了笼统地称赏徐渭诗歌之近于“古”，评点还将其与一些具体的古代作家比较，其中最为集中的比较对象是杜甫。如以下诸例：

似杜纪游诸诗。（卷四《早发仙霞岭》）

置杜集中谁复可辨。（卷六《十六夜宿叶坊玩月》）

似杜。（卷六《赋得芹芽》）

义山词色，少陵音调。（卷七《青州赠鼉砚研，副以诗，奉答》）

的色少陵。（卷八《画坐草栗鼠》）

袁宏道确曾将徐渭与杜甫诗歌作过直接比照，即认为其“夺工部之骨，而脱其肤”，这是“其诗尽翻巢臼，自出手眼”的具体表现³²，与袁宏道的文学发展观念和追求自得创新的主张是一致的。但评点不仅认为徐渭诗歌“似”杜诗，并强调这种“似”的程度，即置于杜集中难分彼此，其“音调”同于杜诗，且为“的色”之杜诗。在这些评价中，徐诗“脱其肤”的自得之处被泯灭了。袁宏道曾以为，“李、杜、王、岑、钱、刘，下迨元、白、卢、郑，各自有诗也，不必李、杜也。赵宋亦然。陈、欧、苏、黄诸人，有一字袭唐者乎？又有一字相袭者乎”³³，这些中郎欣赏的人物都不相袭，亦不袭“李、杜”，徐渭在此方面“稍不愧古人”，又如何能与杜诗这样相近，袁宏道又如何能如此反复地称赏徐诗之近于杜诗呢？

除了杜甫，《徐文长文集》评点还将徐诗与其他古代诗人作比，如以下评点：

似太白古风。（《寄彬中》，卷四）

似韩。（《刈圃》，卷四）

似长吉乐府。（《郑本白兔》，卷五）

明艳跌宕，太白何疑。（《竹染绿色》，卷十）

袁宏道曾曰：“大抵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³⁴而评点反复判定徐诗与前人之“似”，甚至有“太白何疑”这种相当绝对的对徐诗与李白诗歌贴合的评语，这实在违逆于袁宏道对“真”诗的追求，而甚至近乎于袁宏道所批驳的“剽袭模拟，影

响步趋”的创作方式³⁵。

《徐文长文集》评点不仅强调徐渭诗歌接近古人的一面，在评价其散文时亦有此类评语，兹引如下：

就取事发，文愈峭古。（卷二十《代送通府王公序》）

式于古。（卷二十《八骏图序》）

古隽。（卷二十《赠沈母序》）

古峭。（卷二十四《游五泄记》）

袁宏道曾评价徐渭散文“不以模拟损才”³⁶，也就是说，徐渭没有单纯模拟，个人才华尚有足够的施展空间，这与袁宏道反对拟古的文学主张是一致的。引文对徐文“峭古”、“古隽”、“古峭”，乃至“式于古”的称赏，亦与袁宏道的有关认识明显不同。

除以上这些以“古”论徐渭作品的评语，《徐文长文集》评点中还包含一些其他与袁宏道意见相左的地方。如卷四《烦吴伯子治墓堂》一诗的评语：“大雅之作，岂何、李可识。”袁宏道将徐诗与李、何相比的论述有两处，《答梅客生开府》曰：“今代知诗者，徐渭稍不愧古人，空同才虽高，然未免为工部奴仆，北地而后，皆重儻也。”《冯侍郎座主》曰：“宏于近代得一诗人曰徐渭，其诗尽翻巢臼，自出手眼。……无论七子，即何、李当在下风。”前一则虽指出李梦阳“未免为工部奴仆”，但同时也指出其才之“高”，与之相比，徐诗亦只是“稍不愧古人”；后一则“无论七子，即何、李当在下风”中未尝不包含着以何、李作为当时诗坛主要代表的意味。这些评论虽都肯定了徐渭较何、李为优，但对何、李并非一味否定。而且，随着袁宏道对徐渭态度的改变，其关于徐渭与七子的比较亦发生了变化，《答徐可见太府》中认为徐诗在纠正了李、王有关不足（“以摹拟损其骨”）的同时，亦不及李、王的一些长处（李、王“有远体”、“有远韵”，徐渭则“体格位置，小似羊欣书”），是在一种完全平等的水平中比较二者的得失（袁宏道对李王、李何的评价并无太大悬殊）。而在“大雅之作，岂何、李可识”的论述中，徐渭与何、李间似乎有霄壤之别，这不仅有异于袁宏道前一时在有所肯定何、李的前提下称赞徐渭之技高一筹，更不同于其后一时期将徐渭放在与李、王互有优劣的基准中对他们所作的比较。

五

由以上论述可见《徐文长文集》评点的伪作性质，而其作伪者当是那位“得中郎帐中本，遂喜而校刻之”的钟人杰。

钟人杰著有《性理会通》七十卷《续编》四十二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是书成于崇祯甲戌，即《性理大全》而增以明人之说，袁宏道、陈继儒皆跻诸理学儒先之列，则其去取可知矣。”³⁷该书前七十卷即明永乐年间胡广等撰的《性理大全》，《续编》四十二卷为钟人杰“旁罗百氏，如阳明、龙溪、白沙、整庵、复所诸讲语，柏斋、浚川之五行，青田、梁山之象纬，皆近代宗工大儒，翊经阐圣之编，采辑为续，附之卷末”而成³⁸。与之相应，其在篇首所列理学儒先亦分“先儒姓氏”与“皇明姓氏”两类，“皇明姓氏”中列有袁宏道、陈仁锡等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陈仁锡”误为“陈继儒”）。钟人杰将袁宏道列入明代理学儒先之列，可见其对袁宏道的崇仰，这是其托袁宏道之名评点《徐文长文集》的思想基础。

关于钟人杰的生平，现存一些较为零星的材料。虞淳熙于《史记序》中曰：“钱塘人之爱奇者九人，王敬勉而下，如探壁闾雍，非神瑛不沾，既授梓人，非类玉字焉不藏，顾无如钟瑞先、张卿子、邓林宗之奇服，投珉登瑾，惟陈元植是采也。”³⁹张廷登《性理会通叙》曰：“武林钟子人杰，余门下士，博雅好学，于书无所不读、无所不较梓。”钟人杰又曾师从过黄汝亨，黄汝亨为钟人杰所刻《批点前汉书》作序，称“门人钟生瑞先”⁴⁰。由这些材料可以判断，钟人杰是一个较有学问的书商，交游广泛，多所师从，在钱塘地区较有声望。现存由钟人杰辑评、笺注或刊刻的图书主要有：《汉书》一百卷，钟人杰辑评，明万历四十七年钟人杰刻本；《史记》一百三十卷，钟人杰辑评；《后汉书》九十卷，钟人杰辑评；《季汉

书》六十卷，谢陞撰，钟人杰刻本；《通鉴笺注》七十二卷，题明王世贞辑，明汪明际评，明钟人杰笺注，崇祯刻本；《国语》二十一卷，吴韦昭注，明天启六年钟人杰刻本。由此可见钟人杰有着较多辑评、笺注史书的经验，其自然也有评点《徐文长文集》的能力。

钟人杰在刊行《徐文长文集》评点的过程中颇具匠心，主要表现在邀请到与袁宏道曾有过密切交往的虞淳熙、黄汝亨为之作序，且二人与袁宏道的交往，皆主要集中在袁宏道万历二十五年改授教职后游越期间。虞淳熙以万历癸巳（二十一年）去官归钱塘，偕弟僧孺隐南山回峰下三十年⁴¹。袁宏道万历二十五年去吴县令后游览杭州，写下《赠虞德园兄弟》，中有“若使相逢不吐胆，更于何处觅相知”⁴²的表现相知之情的诗句。当年袁宏道又有《虞长孺、僧孺》尺牋⁴³，对其所作《溪上落花诗》大为称赏。虞淳熙则于该年为袁宏道《解脱集》作序⁴⁴，充分肯定了文集中无所畏惧的自我表现勇气。黄汝亨为仁和人，万历二十六年中进士，授进贤知县，万历二十五年袁宏道游杭期间与之交游，以后彼此间有诗书往来。其《与袁中郎》尺牋中曰：“每手大集，读一过，如映对秋月下，嗔痴尽豁，公真大慧力人也。”⁴⁵对袁宏道的作品颇为钦佩。袁宏道正是在与虞淳熙、黄汝亨相识相知的万历二十五年于陶宅发现徐渭文集，并对其大加揄扬的。虞淳熙在为《徐文长文集》评点所作的序中记载了其亲眼目睹袁宏道激赏徐渭作品的情景：

往余开龙月玉文之馆，中郎与陶周望偕来，啖以饵食，有杨家果。中郎揉梅染饵，其章赤白。因问袁：“世文章谁为第一？”陶睨袁匿笑曰：“将无语长孺：徐文长第一耶？”袁曰：“如君言，岂第二人耶？且让元美家钝贼第一耶？”偶诸生耳属壁衣，各骇论，声稍稍出衣外。袁起大索：“此有贼党，可急逐之，令僵死中原白雪中。”余始知文长囊有此士，奉文长居然南面王矣。……而中郎得酝酿真乙酒之法。取以调剂诸子，独推文长，文长遂为第一。迨评选传，真为第一矣，无闻而骇论者矣。……万历甲寅孟秋钱塘虞淳熙长孺父书于山馆。

文中记载的情景当亦发生在万历二十五年。黄汝亨、虞淳熙对《徐文长文集》的支持，成为该书获取可信性的主要手段。

六

《徐文长文集》评点的大量刊行，使其中包含的袁宏道对徐渭作品的肯定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些评价确立了徐渭的地位，使徐渭受到晚明文人的普遍推崇。

在《徐文长文集》评点刊行以前，徐渭并没有太大影响。正如袁宏道《徐文长传》中所说的，“其名不出于越”，故袁宏道见“天池生”之题，“疑为元人作”，也“不知田水月为何人”，直到陶周望介绍，方得知徐渭其人；虞淳熙的《徐文长集序》中亦曾对袁宏道“奉文长居然南面王矣”有所诧异；章重《梦遇》篇首又有“是时尚未噪文长先生，亦不识别有号曰青藤道人也”的记载。但正如虞淳熙的推断，“迨评选传，真为第一矣，无闻而骇论者矣”，也就是说，《徐文长文集》评点一旦流传开来，徐渭就会真地像袁宏道所称颂的那样成为文章“第一”，再没有人会对此表示惊异了。事实上，《徐文长文集》评点确实产生了如虞淳熙所预想的影响力。

天启癸亥（三年），由张岱校辑，张汝霖、王思任评选，蒐辑逸文而成的《徐文长逸稿》二十四卷即采取了与《徐文长文集》一样的评点方式。从《徐文长逸稿》前所载的一些序作中可见徐渭作品在当时已颇为著名。张汝霖《刻徐文长佚书序》曰：“今海内无不知有徐文长矣！而仓猝邂逅之间，断编残简之际，巧而合者，无如袁中郎。方其挑灯夜读，亟呼周望，惊叫称奇，如将欲起文长地下，与之把臂恨相见晚也。”王思任的《徐文长先生佚稿序》则将徐渭置于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曰：“三代以前不可考，吾于短长时寻屈原，寻列御寇，于汉唐下寻王褒，寻杨子云，寻维摩诘，寻李贺，寻韩柳，寻王荆公，于明寻孙太初、桑民怗、卢次楩、王稚钦、天池山人徐渭。渭之才更刁悍尖端，欲据诸公之项而锥其颊。”之所以形成“海内无不知有徐文长”的局面，之所以能让徐渭占有“据诸公之项而锥其颊”的地位，固然有如袁宏道《徐文长传》中描述的那些原因，即“余自是或向人或作书，皆首

称文长先生。有来看余者，即出诗与之读，一时名公巨匠，浸浸知向慕云”，但这种方式的称赏毕竟范围较小，无法比得上书籍造成的影响，可以说，正是《徐文长文集》评点的流行，确立了徐渭在晚明文坛中的地位。

但正如前文的论证，《徐文长文集》评点中其实包含着大量与袁宏道见解相左的对于徐渭作品的评价，当这样的评价被人们认为是袁宏道的意见而广泛接受后，袁宏道的文学思想就较大程度地走样了。尤其是袁宏道文学思想中进步、解放的成分，在这样的传播中有所磨灭（如前文所列举的评点对徐渭作品的“古”意的欣赏，即与袁宏道反对拟古的文学进化观念相左）。《徐文长逸稿》的辑评者张岱，在其所作的《石匱书·文苑列传》中即将归有光、刘凤、汤显祖、徐渭、袁宏道列为一组，并作了这样的判断：“故文长之赏识熙甫，与中郎之赏识文长，针芥相投，水乳忽合，理则应然，何足为怪哉？”索性将袁宏道与徐渭，乃至更为恪守传统的归有光视为“针芥相投，水乳忽合”。其在消泯袁宏道与更具传统色彩的徐渭、归有光作品之差异的同时，几乎抹杀了以袁宏道为首的晚明文学思潮相对于传统文学的解放意义。这种对袁宏道文学思想的理解无疑对晚明后期回归传统的文学走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其由来当是与《徐文长文集》评点的广泛影响有所关联。从中可睹评点在晚明文学发展中所起作用之一斑。

On the Authenticity of Pingdian in the Corpus by XuWenchang —And the Effect of Pingdian in the Literary Development in Late Ming Dynasty

XU Yan

(Research Center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Pingdian in the corpus by XuWenchang is pseudograph. The author is the compiler of the corpus, ZhongRenjie. Pingdian has many different contents from how YuanHongdao evaluated XuWei's works. PingDian established XuWei's status in the literary world then. We can see the effect of Pingdian in the literary development in lat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Pingdian in the corpus by XuWenchang, pseudograph, YuanHongdao, ZhongRenjie.

收稿日期: 2003-3-1

作者简介: 徐艳 (1969-), 女 (汉族), 江苏南通人,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 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

¹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八。

² 该文又见黄汝亨《寓林集》卷三。

³ 《珂雪斋游居柿录》卷九。

⁴ 该文又见《虞德园先生集》卷四。

⁵ 该文又见《歇庵集》卷三。

⁶ 笔者曾对现存的几种完整的万历二十八年刊刻的《徐文长三集》和万历四十七年印行的《徐文长三集》作过校对，包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以下简称华师大本）、南京图书馆藏本（以下简称南图本）、浙江图书馆藏本（以下简称浙图本）、美国国会图书馆摄制北平图书馆善本书胶片（以下简称北图本），这几本书都标作万历二十八年商维濬刻本；另有上海图书馆藏万历四十七年商维濬刻本（以下简称上图本）。诸种刻本的不同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陶望龄序有的为五叶，有的为七叶；其二，诸本皆存在目录编排的舛误，其中较为严重的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卷十一《雪竹》以后的约一百八十首诗题与正文顺序、内容不同，并掺杂了卷八、九、十等已经出现过的篇目，第二种是卷七《红拂桑六首》后，直至该卷卷终的

约八十首诗题与正文排序颠倒，且内容略有参差。与之对照，上图本陶序为五叶，目录错误属第一种情况。华师大本陶序为七叶，目录错误为第二种情况。浙图本陶序为七叶，目录错误为第一种情况。由于上图本中含有商维濬作于万历四十七年的《刻徐文长集原本述》，故刊刻时间较为可靠。华师大本与上图本差距最大，浙图本中既有与上图本一致的内容，如目录错误为第一种，也有与华师大本一致的内容，如陶序为七叶。而南图本、北图本情况一样，除删略了作于万历四十七年的商维濬《刻徐文长集原本述》，其它内容都与上图本一致，即陶序为五叶，目录错误属第一种情况，可以初步判断它们都是万历四十七年的版本删略了商序而成，将其定为万历二十八年版本，实属编目失误。由以上情况可以推断，诸本中存在着两种刻版，一种当为万历二十八年所刻，一种是万历四十七年重刻时，对有所损坏的万历二十八年刻版的补充，即商维濬《刻徐文长集原本述》中“次第所藏板，印而行之”云云。万历二十八年的刻版本本身就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目录的舛误，这种舛误到万历四十七年重刻时变得更为严重，出现了旧的刻版与新的刻版交错使用的情况，如第一种目录错误中在将卷八、九、十的目录编入卷十一时，就部分地使用了旧的刻版，其中卷十《两蝗虫》后佚《又萝葡》，属于旧版的目录排序，而卷十一前的卷十目录中的《两蝗虫》后就有《又萝葡》，这又当是使用了新的刻版。这种刻板情况一方面可以证明确实存在万历二十八年的本子，否则当不会有以上所述的两种刻版并存、交错的情况；另一方面，商维濬刻本的多有舛误，也是让钟人杰刻本后来居上的重要原因之一。

⁷《解脱集》卷四，明万历三十八年袁氏书种堂刻本。

⁸《瓶花斋集》卷九，明万历三十六年袁氏书种堂刻本。

⁹《瓶花斋集》卷九。

¹⁰《瓶花斋集》卷十。

¹¹陶望龄与商维濬不仅同里，且为姻亲、挚友。商氏为会稽望族，商维濬曾辑有大型丛书《稗海》，其舅“黄门钮石溪先生锐情稽古，广搆穷搜，藏书世学楼者积至数千函、百万卷”，故其“时得纵观”，并编成《稗海》（商维濬《稗海》序）。由《稗海》的刊刻，可知商维濬及其家族的实力。陶望龄曾作有《商半塾像赞》，其曰：“山隐过幽朝太近，有唐乐天爱中隐。郊居蛙黾市车马，兄居其间曰半塾。维中维半与道几，迹有寄寓无厌离。欲知其人脉于兹。”（《歇庵集》卷十）商半塾即为商维濬，所谓“兄居其间曰半塾”指商维濬之半塾堂，现存万历刻本《稗海》之排记中即有“商氏半塾堂”的字样，此外，之所以称商维濬为“兄”，是因陶望龄与之有姻亲关系。陶望龄曾作有《祭商仲文》，文曰：“姻连之间，申以交谊。”（《歇庵集》卷十四）《内兄商仲文墓碣》又曰：“仲文商氏，初讳洛，更名维河，仲文字也。”（《歇庵集》卷十八）可知这位过世的姻亲名商洛，更名维河。商维濬初名商濬，更名商维濬，当与商洛为同辈兄弟，故与陶望龄亦有姻亲关系。《歇庵集》卷十二又载《上岳父商公》尺牍，卷十七则收有陶望龄为这位岳丈所作的墓志铭《大理寺左少卿燕阳商公墓志铭（代朱相君）》，中有“公讫来都，邵武君方谒选，以公婿上谕德陶望龄所为状乞铭于予”云云，此文为代作，陶望龄另作有岳丈行状，《歇庵集》卷七还有《寿商母刘太孺人序》等文。由此可知陶望龄与商维濬及其家族极为亲近的关系。且万历辛亥（三十九年）刊行《歇庵集》时，商维濬亦有校阅之功。对陶望龄与商维濬亲密关系的罗列，只是为了说明在《徐文长三集》“衰而刻之”的过程中，商维濬虽“游渭时，心许为汇刻之”，但陶望龄源于对徐渭作品之传播责任的敦促之力当不可忽视。

¹²《歇庵集》卷十二。

¹³《瓶花斋集》卷九，作于万历二十六年。

¹⁴《瓶花斋集》卷九，作于万历二十六年。

¹⁵《瓶花斋集》卷十，作于万历二十七年。

¹⁶《书田生诗文后》，《徐文长逸稿》卷十六。田生，即田水月，为徐渭别名。

¹⁷《潇碧堂集》卷十八，明万历三十六年袁氏书种堂刻本。

¹⁸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三引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

¹⁹《瓶花斋集》卷七。

²⁰《潇碧堂集》卷十九。

²¹《中郎先生全集序》，《珂雪斋集》卷十一。

²²《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珂雪斋集》卷十八。

²³《锦帆集》卷二，明万历三十七年袁氏书种堂刻本。

²⁴《锦帆集》卷二。

²⁵《锦帆集》卷四。

²⁶《解脱集》卷四。

²⁷《解脱集》卷四。

²⁸《瓶花斋集》卷六，作于万历二十七年。

²⁹《瓶花斋集》卷六，作于万历二十八年。

³⁰《潇碧堂集》卷十一，作于万历三十二年。

³¹《潇碧堂集》卷十九，万历三十四年。

³²《瓶花斋集》卷十，作于万历二十七年。

³³《锦帆集》卷四。

³⁴《锦帆集》卷四。

³⁵《锦帆集》卷二，明万历三十七年袁氏书种堂刻本。

-
- ³⁶ 《瓶花斋集》卷七。
- ³⁷ 《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六。
- ³⁸ 钟人杰《性理会通序》。
- ³⁹ 《虞德园先生集》卷四。
- ⁴⁰ 《寓林集》卷一。
- ⁴¹ 黄汝亨《吏部稽勲司员外郎德园虞公墓志铭》，《寓林集》卷十五。
- ⁴² 《解脱集》卷一。
- ⁴³ 《解脱集》卷四。
- ⁴⁴ 《虞德园先生集》卷四。
- ⁴⁵ 《寓林集》卷二十五。